

# 高校扩招对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差异研究

胡宝翔

西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9日

## 摘要

根据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 对高校扩招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教育代际流动性特征进行分析。高校扩招总体上提高了教育代际流动性, 提高了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但不同背景家庭在高校扩招中的获益特征却显示出巨大差异。高校扩招虽然极大改善了农村和低教育水平家庭子女的境况, 但城镇家庭子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中的子女获益更多并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城乡间的差距仍然显著。因此, 促进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 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需要在政策层面进行积极的调整。

## 关键词

高等教育, 教育代际流动, 高校扩招, 城乡差异

## A Study on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oxiang Hu

School of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rch 16, 2026; accepted: May 7, 2026; published: May 19, 2026

##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2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20) data, a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educ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since the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enrollment. The overall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enrollment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educ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in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However, the benefits obtained by different background families during the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pansio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though the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enrollment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situation of children from rural and low-education level families, the children from urban families and those from families with par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have benefited more and still hold an absolute advantage.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mains significant.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ruly achieving educational equity requires active policy adjustments at the policy level.**

##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pansion, Urban-Rural Disparit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教育是构建强大国家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对国家繁荣、民族崛起、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教育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核心议题，教育代际流动性是衡量教育公平与社会结构开放性的关键指标，其背后的教育代际传递(Educ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MI)理论更是成为教育分层领域的核心分析框架。EMI 理论聚焦于家庭背景尤其是父母教育水平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认为教育资源的代际传递会形成阶层再生产，而教育政策的调整则可能成为打破这一再生产、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干预变量，这一理论也为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分层现象提供了通用的理论视角。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大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依赖于教育的充分发展。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sup>1</sup>。作为教育领域领头羊的高等教育事业，不仅承担着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科教融合及产教结合等方面的责任与使命，更是通过政策调整影响 EMI 效应、重塑教育代际流动格局的核心载体。1999 年启动的高校扩招政策，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规模扩张举措，其核心目标之一便是拓宽高等教育入口，让更多普通民众获得高水平教育机会，进而弱化教育代际传递的阶层再生产效应。

2023 年，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总投入达到了 6459.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3%，其中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 5043.3 亿元，占 GDP 的 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99 年的 10.5% 跃升至 60.2%，正式进入全球公认的高等教育普及阶段；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 14 年，全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 2.5 亿，占总人口的 17.73%，我国已构建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系统，各级教育的普及程度与中高收入国家持平或更高。

得益于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显著增加，子代相较于父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等教育获得比例均实现质的提升，教育代际向上流动性呈现增强趋势，这

<sup>1</sup>[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看似与 EMI 理论中“公共教育政策可弱化教育代际传递”的核心假设相契合。但深入审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背景，地区间、城乡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和家庭背景差异导致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突出，不同群体在高校扩招中的受益存在显著异质性，这使得我国的教育代际流动现象无法简单用经典 EMI 理论进行单一解释。经典 EMI 理论多基于西方均质化的社会结构展开研究，而我国城乡分割的教育资源分配体系、差异化的家庭资本积累模式，让高校扩招对 EMI 效应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城乡特征。

基于此，本文以 EMI 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依托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聚焦高校扩招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的教育代际流动性特征，旨在回答：高校扩招是否真正弱化了我国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这一效应在城乡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农村与城镇家庭在高校扩招中对 EMI 效应的改变是否呈现出不同的规律？本研究将经典 EMI 理论置于中国城乡二元的独特语境下进行检验，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的现实进程修正其适用边界，同时补充“宏观教育政策-城乡结构-家庭资本”三维互动下的 EMI 效应演化机制，既为理解当代中国的教育分层与社会流动提供经验证据，也为 EMI 理论的跨语境应用提供中国案例，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2. 文献综述

教育代际传递(EMI)是教育分层领域的核心概念，也是社会分层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延伸，其核心内涵是家庭背景尤其是父母的教育水平会通过资源传递、文化熏陶、社会资本等多种机制，对子代的教育获得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而形成教育优势的代际再生产，最终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1]-[4]。经典 EMI 理论的研究可追溯至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其指出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是导致教育代际传递的核心动因，优势阶层家庭的文化惯习与学校教育文化逻辑相契合，使其子女更易在教育竞争中获胜；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则进一步补充，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越丰富，能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入、升学指导和机会资源，从而强化教育代际传递效应[5]-[9]。

此后，西方学者围绕 EMI 理论展开了大量实证检验，形成了两大核心研究脉络：一是探究 EMI 效应的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异质性，以及学校教育、公共政策的调节作用；二是分析教育政策对 EMI 效应的干预机制，普遍认为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分配、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等政策，能够有效弱化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这也成为各国制定教育公平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但西方现有研究多基于市场经济成熟、社会结构均质化的背景，对城乡二元结构显著的发展中国家关注不足，也未充分考虑高等教育扩招在不同城乡资源禀赋下的差异化 EMI 干预效果，这为后发国家的研究留下了理论补充空间[10]-[13]。

我国于 1952 年首次引入高考制度，1977 年恢复后成为我国人才选拔和教育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1999 年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更是从供给侧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格局，成为干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的重要宏观政策。为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我国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sup>2</sup>、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sup>3</sup>及“211 工程”“985 工程”“双一流”建设计划，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持续扩大高等教育覆盖范围。

国内学者围绕高校扩招与教育代际流动展开了大量研究，其结论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方面，高校扩招显著提升了我国的整体教育代际流动性，促进了教育代际绝对流动。张楠(2022)指出，高校扩招虽提升了低阶层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水平，但并未有效改善农村家庭和中西部家庭世代间的教育相关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并未明显缩小，教育代际传递的核心机制仍未被打破[14]。彭骏(2021)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发现，高校扩招等教育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和中西部家庭的教育向上流动性，让低教育

<sup>2</sup>[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257.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204/t20220421_620257.html)

<sup>3</sup>[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008/t20100802\\_93704.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008/t20100802_93704.html)

背景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这与经典 EMI 理论中“高等教育扩张可弱化教育代际传递”的核心假设相契合,验证了 EMI 理论在我国的基本适用性[15]。另一方面,高校扩招对教育代际相对流动的改善效果有限,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教育代际传递的阶层再生产格局。现有研究表明,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差异显著体现在城乡和地区维度,这也是我国研究与西方经典 EMI 理论研究的核心差异所在,其根源在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和家庭资本的显著差异[16]-[18]。

在地区差异方面,高校扩招政策对 EMI 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教育资源丰富的东部省份,扩招政策有助于弱化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与经典 EMI 理论的结论一致;而在教育资源匮乏的西部省份,扩招政策反而强化了这一效应,原因在于西部低教育背景家庭缺乏利用扩招机会的家庭资本和教育资源,最终导致高等教育机会仍向优势家庭集中。这一研究揭示了教育资源禀赋对 EMI 政策干预效应的调节作用,是对经典 EMI 理论的重要补充[17]-[21]。

在城乡差异方面,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显著低于城镇地区,成为我国教育代际流动研究的核心共识。有学者对 1941~1990 年间出生的居民研究发现,城镇居民的教育代际流动性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和农转非居民,反映了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对 EMI 效应的强化作用[22]。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虽有所增强,教育不公平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城乡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差异仍然显著,高校扩招的红利并未被城乡家庭均等享受,农村家庭的 EMI 效应仍远高于城镇家庭。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已围绕高校扩招与教育代际流动展开了大量探讨,也初步揭示了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但仍存在两方面的核心不足:一是理论对话不足,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实证分析,未能以 EMI 理论为核心框架,将研究发现与经典理论进行系统性对话,既未充分验证 EMI 理论在我国城乡二元背景下的适用边界,也未结合我国现实对 EMI 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二是机制分析不够深入,现有研究虽指出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但未清晰界定高校扩招对城乡 EMI 效应的差异化影响机制,也未量化分析扩招政策在城乡不同家庭背景下的 EMI 干预效果。

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定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论验证,将经典 EMI 理论置于中国高校扩招的现实背景下,检验“高等教育扩张弱化教育代际传递”这一核心假设在我国是否成立,以及成立的条件和范围;第二,理论修正,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特征,修正经典 EMI 理论的均质化社会假设,引入“城乡教育资源禀赋”作为调节变量,完善 EMI 效应的政策干预机制;第三,理论补充,量化分析高校扩招对城乡不同教育背景家庭 EMI 效应的差异化影响,构建“宏观教育扩招政策-城乡结构-家庭教育资本”三维互动的 EMI 效应演化框架,为 EMI 理论的跨语境应用提供中国经验。

本文将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20 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从 EMI 理论的核心视角出发,运用教育代际转换矩阵与 Mosteller 标准化处理方法,区分高校扩招带来的普遍教育水平提升效应和父母与子女教育程度的内在关联性流动效应,系统探讨我国高校扩招进程中城乡居民的 EMI 效应演化特征,分析不同城乡、不同家庭教育背景群体在高校扩招中的受益差异,最终揭示高校扩招对城乡 EMI 效应的影响机制,为促进教育公平、弱化教育代际传递提供政策参考。

###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20 年进行的住户调查,该调查覆盖了全国 25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鉴于本文研究聚焦于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后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性,选择子代出生年份介于 1981 年至 1995 年之间的样本群体。做出这一选择是因为该群体恰好从 1999 年开始参加高考,全部有机会获得高校扩招带来的机会,并且在 2020 年被调查时最迟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反映高等教育扩招实施后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而其家庭教育背景通过住户调查中的家庭编码进行子女与父母信息的匹配,最终筛选出 8662 条有效样本信息。

本文使用代际转换矩阵来描述教育的代际流动性。根据子女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构建了一个  $5 \times 5$  的转换矩阵  $p_{ij}$ 。其中,  $i$  和  $j$  分别表示父母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p_{ij}$  表示转换概率, 即父母受教育程度为  $i$  而子女受教育程度为  $j$  时的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p_{ij} = \frac{\#\{\text{子女受教育程度} = j, \text{且父辈受教育程度} = i\}}{\#\{\text{父辈受教育程度} = i\}} \quad (1)$$

并且满足条件  $\sum_j p_{ij} = 1$ 。这个转换矩阵描述了在给定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 子女达到某一特定教育水平的可能性, 它揭示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关系。通过这种转换矩阵, 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不同分组下父母与子女的受教育情况。

受教育程度的代际转换矩阵反映了父代与子代间教育的代际流动性, 这一流动性既包含由于高校扩招导致的子女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而引发的流动, 也包含在假设没有政策影响的情况下, 父母与子女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流动。由于本文要考察高等教育扩招后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差异, 通过应用 Mosteller 的方法对原始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来区分教育代际流动中的这两种不同的流动。此方法假设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 父母与子女受教育程度分布是相同的, 它通过对原始矩阵进行一系列行和列的交替标准化调整, 最终使得行与列的边际概率分布趋于一致, 从而模拟出没有外界因素影响下的情况下代际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况。调整过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I) 展示了原始数据, 其中行和列分别有两种可能性: A 与 A1、B 与 B1。表 1 (II) 首先按照行进行标准化处理, 接着, 表 1 (III) 按照列进行标准化处理。经过多次行和列的交替标准化后, 分布逐渐收敛至表 1 (IV) 所示的情况, 此时行与列的边际概率分布变得相同, 此即为经过 Mosteller 标准化的结果矩阵。这种经过标准化后的矩阵所保留的概率就是仅包含内在关联性流动的代际转换概率。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在没有高校扩招的情况下, 父母与子女之间受教育程度的代际传递模式, 并为评估教育政策的效果提供一个对比。

**Table 1.** The Mosteller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表 1.** Mosteller 标准化过程

	原始数据(I)			行标准化(II)			
	B	B1	合计	B	B1	合计	
A	100	10	110	A	0.909	0.091	1.000
A1	5	2	7	A1	0.714	0.286	1.000
合计	105	12	117	合计	1.623	0.377	
	列标准化(III)			经过若干次行、列交替迭代后(IV)			
	B	B1	合计	B	B1	合计	
A	0.560	0.241	0.801	A	0.667	0.333	1.000
A1	0.440	0.759	1.199	A1	0.333	0.667	1.000
合计	1.000	1.000		合计	1.000	1.000	

记 Mosteller 标准化矩阵为  $(\widehat{p}_{ij})_{5 \times 5}$ , 其中  $i$  和  $j$  仍然分别表示父母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widehat{p}_{ij}$  表示经标准化后的转换概率,  $\widehat{p}_{i \cdot}$  和  $\widehat{p}_{\cdot j}$  分别表示行和列的边际概率分布。对于  $i = j$  的情况, 有  $\widehat{p}_{i \cdot} = \widehat{p}_{\cdot j}$ , 即假设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父母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是相同的。尽管 Mosteller 标准化矩阵

调整了行和列的边缘分布，但它保留了行与列之间的关联性，也即保留了教育代际内部关联性流动。

此时，就能利用原始矩阵和标准化矩阵的转换概率来准确计算出高校扩招究竟带来多少流动性的提升，从而考察高校扩招的政策效果。定义高校扩招带来的教育代际流动性指标的计算方法：用原始转换概率  $p_{ij}$  和标准化后的概率  $\hat{p}_{ij}$  做差，也即用综合转换率减去内部关联性流动转换率，得出的  $p_{ij} - \hat{p}_{ij}$  就表示高校扩招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改善程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量化评估高校扩招对于不同教育背景家庭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政策究竟有没有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以及有没有促进全社会教育公平。

#### 4. 受教育情况和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总体特征

表 2 展示了本文所选取样本中子女与父母受教育年限及受教育程度分布的基本特征。受教育程度被划分为五个层次：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样本中共有 8662 名子女，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3 年。在教育程度的分布上，样本中子女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 33.88%，为占比最高的学历水平。

从城乡差异来看，城镇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2.46 年，这相当于完成了高中阶段的教育，相比之下，农村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10.06 年，显著低于城镇子女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显示出明显的城乡差距。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上，城乡显示出了更显著的差异——农村子女中大专以上学历占比 21.11%，而城镇却有 45.76%，足有农村的两倍有余。从性别角度来看，女性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性高出 0.23 年，这一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单独比较城乡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占比又能发现，相比于其他学历水平，男性的占比要明显低于女性。这些数据揭示了城乡和地区间教育机会和成果的不均衡分布，以及性别在不同教育阶段上的差异表现。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years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表 2. 子女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与教育程度分布

		样本量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程度分布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学历
子女	全部	8662	11.30	4.05	9.99	32.30	19.78	33.88
	农村	4173	10.06	6.33	14.35	38.96	19.24	21.11
	城镇	4489	12.46	1.94	5.93	26.11	20.27	45.76
	男性	4889	11.20	3.15	10.84	33.93	20.88	31.19
	女性	3773	11.43	5.22	8.88	30.19	18.34	37.37
父亲	全部	8220	6.95	21.08	27.42	33.29	15.00	3.21
	农村	6876	6.25	24.58	30.41	33.23	11.33	0.45
	城镇	1344	9.67	7.74	15.63	34.08	28.57	13.99
母亲	全部	8206	4.86	41.64	25.61	22.80	8.07	1.88
	农村	7054	4.06	47.26	27.66	20.54	4.28	0.26
	城镇	1152	8.41	16.41	15.97	34.20	24.31	9.11

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方面，父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母亲高出 2.09 年，但父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仅为 6.95 年，远低于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其受教育程度都显示出显著的城乡

差异。城镇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比农村父亲平均高出 3.42 年，二者分别为 9.67 年和 6.25 年，城镇父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致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而农村父亲则仅达到高小水平，两者相差约一整个教育阶段。对于母亲而言，城乡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城镇母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41 年，而农村母亲仅为 4.06 年，两者相差 4.35 年。在城乡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方面，父代比子代显示出了更悬殊的对比，农村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占比均不足百分之一，而城镇父母的占比却分别有 13.99% 和 9.11%，是农村占比的 30 多倍。这些数据突显了城乡之间父母一代教育背景的巨大差异，也初步显示出了高校扩招给予子代学历提升和教育公平带来的好处。

比较父母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发现，从受教育年限来看，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父亲高出 4.35 年，比母亲高出 6.44 年。体现在受教育程度占比上则是子代接受过高等教育占比 33.88%，而父母则分别只有 3.21% 和 1.88%。进一步观察分城乡接受高等教育的父母与子女的占比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都大幅度增加，但将二者对比又能发现，农村样本的增幅要显著大于城镇样本的增幅，城镇样本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仍显著高于农村，显示出了明显的城乡差异。通过对比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受教育年限和占比，可以清晰地看到，总体上社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有了显著的提升，这反映了随着高校扩张，新一代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人民的文明素养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城乡间对比的差异也在提醒我们，城乡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仍有很大差距，农村群体仍处在社会发展的弱势地位，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仍没有实现城乡地域间的平等发展，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为了对教育的代际流动性进行初步考察，对父代与子代的受教育年限进行联立，这里使用交叉列联表来考察两者的关系。以父亲与子女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为例，如表 3 所示，表格中的行代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列代表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每个单元格显示的是具有相应受教育程度的父亲和子女组合占全部样本的比例。行合计数和列合计数分别表示父亲和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边缘分布。在原始列联表中，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 3.21%，而子女中这一比例则高达 33.88%。这种代际间的边缘分布差异，清晰地反映了由于高校扩招所带来的普遍教育水平提升。通过对比父母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边缘分布，可以看到，随着扩招政策的实施，年轻一代在受教育方面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更多的机会，这不仅体现了高校扩招的效果，也展示了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

**Table 3.** The original cross-tabulation table of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fa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表 3.** 父亲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原始交叉列联表

		子女受教育程度					合计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学历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2.70	4.03	7.83	2.82	3.71	21.08
	小学	0.74	3.21	10.36	5.60	7.52	27.42
	初中	0.45	2.15	10.12	7.72	12.85	33.29
	高中	0.16	0.59	3.86	3.26	7.13	15.00
	大专及以上学历	0	0.01	0.14	0.38	2.68	3.21
	合计	4.05	9.99	32.30	19.78	33.88	100

为了更进一步将整体流动性区分为由于高校扩招导致的子女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而引发的流动和父母与子女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流动，对原始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在表 4 的 Mosteller 标准化列联表中，将行和列的边缘分布均设定为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比率，假设在没有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子女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是相同的。通过比较标准化后的列联表与原始列联表，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当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时，其按父亲学历划分的比例分别从原始表中的 3.71% 下降至标准化表中的 0.48%、从 7.52% 下降至 1.83%、从 12.85% 下降至 4.14%、从 7.13% 下降至 2.69%、从 2.68% 下降至 1.95%。这种变化表明，如果没有高校扩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将显著下降，尤其是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一对比揭示了高校扩招对提升整体教育水平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改善低教育背景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政策干预，低教育背景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则会变得更加渺茫。

**Table 4.** The cross-tabul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fa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standardized by Mosteller  
**表 4.** 经过 Mosteller 标准化的父亲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交叉列联表

		子女受教育程度					合计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学历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11.03	5.67	2.74	1.17	0.48	21.08
	小学	5.72	8.57	6.89	4.40	1.83	27.42
	初中	4.61	7.58	8.92	8.04	4.14	33.29
	高中	1.94	2.43	3.97	3.96	2.69	15.00
	大专及以上学历	0	0.09	0.28	0.89	1.95	3.21
	合计	21.08	27.42	33.29	15.00	3.21	100

## 5. 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城乡差异

为了更深入地描述不同人群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特征，表 5 和表 6 分别展示了分城乡的教育代际流动转换非标准化和标准化矩阵。这些矩阵揭示了一个共同特征：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尽管高校扩招显著改善了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但高校扩招的主要受益者仍然是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子女。这表明，虽然高校扩招有助于缩小不同背景家庭之间的教育差距，但原有教育资源的优势仍然显著影响着子女的教育成就。这一发现强调了在制定教育政策时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确保更多资源向低教育背景家庭倾斜，以促进更加公平的教育代际流动性，特别是对于农村和城市相对弱势的家庭。

**Table 5.**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urban education  
**表 5.** 城镇教育代际流动性

		子女受教育程度									
		非标准化转换矩阵					标准化转换矩阵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6.29	14.74	36.91	16.60	25.46	44.86	33.41	15.63	6.75	2.37
	小学	2.37	7.76	32.85	21.81	35.22	28.44	29.59	23.40	14.93	5.52
	初中	0.80	3.88	24.72	22.81	47.78	14.81	22.83	27.17	24.09	11.55
	高中	0.48	1.80	17.65	19.69	60.38	11.89	14.17	25.96	27.82	19.53
	大专及以上学历	0	0	2.51	8.79	88.70	0	0	7.85	26.41	61.02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4.49	11.87	37.13	18.56	27.95	44.20	34.94	17.13	6.18	1.70
	小学	1.37	5.85	29.98	24.04	38.76	25.22	32.20	25.87	14.97	4.41
	初中	0.40	2.00	20.05	22.85	54.69	13.20	19.73	31.00	25.50	11.15
	高中	0.36	0.91	10.00	14.73	74.00	17.38	13.13	22.62	24.05	22.07
	大专及以上学历	0	0	0.67	8.05	91.28	0	0	3.38	29.30	60.67

**Table 6.**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rural education  
**表 6.** 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

		子女受教育程度									
		非标准化转换矩阵					标准化转换矩阵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16.86	21.83	37.27	11.36	12.69	55.00	24.18	12.13	5.15	4.53
	小学	2.97	15.09	41.99	19.23	20.72	17.27	29.79	24.36	15.53	13.18
	初中	2.06	9.75	37.72	23.69	26.78	13.40	21.54	24.48	21.41	19.06
	高中	2.15	7.73	40.13	25.32	24.68	14.32	17.48	26.66	23.43	17.98
	大专及以上	0	2.56	15.38	30.77	51.28	0	7.01	12.38	34.48	45.25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10.98	18.72	39.43	15.62	15.25	55.27	21.89	13.01	6.30	4.34
	小学	1.25	11.74	39.86	22.06	25.09	12.78	27.89	26.72	18.08	14.49
	初中	1.51	7.83	37.36	23.90	29.40	16.14	19.44	26.17	20.47	17.75
	高中	1.34	3.36	36.24	26.85	32.21	15.81	9.21	28.02	25.38	21.46
	大专及以上	0	7.14	7.14	28.57	57.14	0	21.57	6.09	29.77	41.97

表 5 和表 6 均显示，无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如何，子女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在非标准化转换矩阵中都明显高于标准化转换矩阵的结果。通过对比两者在对应位置上的比率差异，可以发现这种差距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大。例如，在城镇家庭中，当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时，非标准化转换矩阵中子女也为大专及以上的可能性为 25.46%，而在标准化转换矩阵中这一比例则只有 2.37%，两者相差约 23 个百分点。这表明，高校扩招显著提高了低教育背景家庭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其他阶段的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的特征，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高校扩招对子女教育水平提升的影响越大。这说明，高校扩招大幅提高了这些家庭子女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强调了其在促进低教育背景家庭子女教育进步上的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高教育背景家庭来说，虽然低教育背景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大幅增加，其占比仍然很少。

表 7、表 8 和图 1 展示了分城乡的高校扩招效应差异。从城镇与农村地区的比较来看，无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如何，都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总体而言，城镇子女从高校扩招中获得的好处明显高于农村子女。然而，城镇样本有一个特征：在父代学历为大专以下时，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从高校扩招中受益的程度也越高，但是农村样本却不具有这一特征。如果父亲接受过高中教育，高校扩招使得城镇子女达到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增加了 40.85 个百分点；若母亲接受过高中教育，这一增幅则有 51.93 个百分点，而农村群体则分别只有 6.7 个百分点和 10.75 个百分点，并且与其他受教育程度群体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父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较大地提升了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从城乡对比的角度看，高校扩招的主要受益者更倾向于城镇居民，并且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从中受益更大。这种现象突显了在制定教育政策时需要更加关注如何平衡城乡之间以及不同教育背景家庭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以促进更为公平的教育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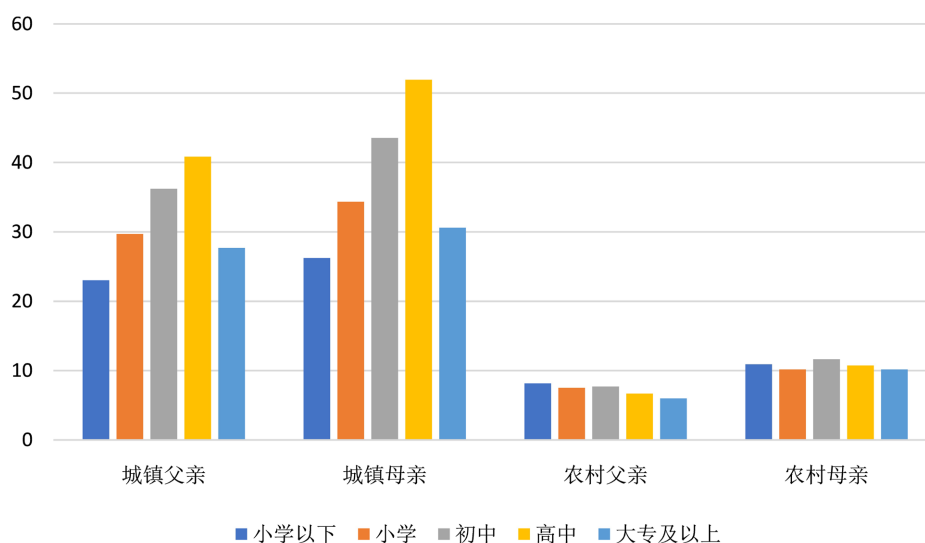
**Table 7.** The incremental effect of educational expansion on the possibility for children from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in urban areas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

**表 7.** 教育扩张对城镇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性的增量效应

父亲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母亲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23.03	29.70	36.23	40.85	27.68		26.25	34.35	43.54	51.93	30.61

**Table 8.** The incremental effect of educational expans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amilies in rural areas to access higher education**表 8.** 教育扩张对农村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性的增量效应

父亲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母亲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8.16	7.54	7.72	6.7	6.00		10.91	10.19	11.65	10.75	10.17

**Figure 1.** The incremental effect of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pansion on the possibility for children from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 (%)**图 1.** 高校扩招对城乡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性的增量效应(%)

## 6. 结论与建议

基于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数据,以 1999 年高校扩招为政策背景,从教育代际流动性视角分析城乡群体的受益差异,本研究证实高校扩招对我国教育代际流动呈现出显著的双重效应:一方面,扩招政策带来了全民教育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大幅增加了底层家庭子女教育向上流动的绝对机会,不仅让城镇高教育背景家庭子女获得更多高等教育资源,更极大改善了农村和低教育水平家庭子女的教育境况,使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较扩招前有了质的提升,整体上增强了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推动了社会整体教育层次的跃迁,彰显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普惠价值。另一方面,受城乡间社会结构性优势差异的深层影响,高校扩招未能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未能有效缩小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相对差距,甚至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差异。城镇家庭凭借先天的教育资源、家庭文化资本、升学辅导等结构性优势,成为扩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其子女不仅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子女,且从扩招中获得的教育代际流动提升效应显著大于农村子女;而农村家庭子女即便获得了更多上大学的机会,仍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取上处于绝对弱势,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正向影响在农村地区也未形成显著的传导效应,城乡之间的教育代际流动鸿沟并未因扩招而得到实质性弥合。

总体而言,高校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普及化的跨越,有效提升了我国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整体水平,但受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分配、家庭文化资本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其在促进教育公平、弱化教育代际传递的相对效应上效果有限,城乡群体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不均衡问题仍突出,教育公平的实现仍需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干预。

高校扩招的双重效应表明，促进教育公平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要在普惠的基础上弥补结构性差距。结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sup>4</sup>要求，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教育成果公平惠及全民为目标，针对农村和弱势群体学生设计精准化、差异化的教育政策体系，既保障其“能上大学”，更助力其“上好大学”，推动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相对均衡，具体建议如下：

设计招生体系中的积极差异化措施，拓宽农村学生进入优质高校的通道。一是优化高考招生区域分配机制，结合农村生源基数和教育发展实际，适度提高优质高校对农村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招生配额，尤其是部属高校、“双一流”高校要明确农村生源占比底线，避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过度向城镇集中；二是完善专项招生计划，升级“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扩大计划覆盖范围和招生规模，简化农村学生报考审核流程，同时增设农村学生专属的综合素质评价维度，弱化城镇家庭在竞赛、社会实践等方面的优势，让招生评价更贴合农村学生的成长实际；三是探索高等教育分类招生的农村适配模式，针对农村学生的学业基础和发展需求，在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院校设置农村生源单招通道，实现“上好大学”与“适切发展”相结合。

构建阶梯式资助体系，破解农村学生高等教育的经济与发展双重壁垒。一方面，强化经济资助的精准性和全覆盖，建立以“国家助学金 + 助学贷款”为基础，“校级奖学金 + 社会助学金”为补充的阶梯式资助体系，对农村低收入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实行学费全免 + 生活补助的兜底政策，彻底解决农村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另一方面，增设发展性资助项目，针对农村学生进入高校后可能面临的学业适应、能力提升、就业指导等短板，设立农村学生学业帮扶基金、科研创新基金、实习实践补贴，为其配备学业导师，开展高校与农村高中的衔接培养，帮助农村学生快速适应高校学习生活，提升其在优质高等教育环境中的发展能力。

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夯实农村学生的基础教育根基。教育公平的关键在基础教育，要从源头弥补农村学生的学业差距，为其后续进入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阶段奠定基础。一是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倾斜力度，完善农村学校硬件设施，实现城乡教育教学设备、信息化资源的均等化配置；二是推动优质师资向农村流动，建立城镇骨干教师对口支援农村学校的常态化机制，落实农村教师的薪资补贴、职称评定优惠政策，提升农村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三是在农村中小学增设升学指导、素质拓展等课程，引入高校研学、校园宣讲等资源，弥补农村家庭在升学信息、教育视野上的不足，让农村学生从小获得平等的教育发展机会。

完善农村高等教育配套服务，打通教育代际流动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建立农村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机制，联合企业、基层单位为农村毕业生提供专属就业岗位，对返乡创业、基层就业的农村毕业生给予创业补贴、岗位补贴，提升其教育回报水平；二是搭建农村学生高校交流平台，鼓励高校成立农村生源互助社团，促进农村学生之间的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缓解其在高校的社交和发展焦虑；三是推动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的深度融合，鼓励高校针对农村实际需求设置相关专业和课程，引导农村学生结合家乡发展选择专业，实现个人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结合，让高等教育成为推动农村发展和教育代际流动的双向动力。

## 基金项目

甘肃省科技厅软科学专项：甘肃省劳动力数量结构变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25JRZA169。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低空经济的发展重点与发展路径研究；2024YB034。

<sup>4</sup><https://www.sxie.edu.cn/bkpgw/info/1032/1815.htm>

## 参考文献

- [1] 方超, 叶林祥.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J]. 教育学报, 2024, 20(4): 172-183.
- [2] 陈悦娴, 冯婧, 张力文, 等. 教育代际流动性研究综述——方法、因素与展望[J]. 经济研究导刊, 2024(10): 131-136.
- [3] 温军英, 王伟宜.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6): 121-129.
- [4] 刘金典, 程名望, 吴春燕.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J]. 经济学动态, 2023(7): 91-109.
- [5] 孙俊华, 万洋. 规模扩张下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测度——兼论高校扩招的教育代际流动效应[J]. 教育与经济, 2023, 39(3): 53-63.
- [6] 李文华, 张务农. 教育代际流动: 理论、逻辑及实践转向[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3(1): 52-59.
- [7] 赵心源. 经济体制改革与教育代际流动演变趋势研究[J]. 中国物价, 2023(2): 103-105+109.
- [8] 吴涛. 乡村教育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3, 37(4): 14-27.
- [9] 赵媛, 唐安琪, 吴沁宇. 家庭资本对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性别差异的影响——基于 CGSS2017 年数据[J]. 江苏高教, 2022(12): 82-89.
- [10] 胡志安. 中国教育代际流动——方法与事实[J]. 经济科学, 2022(5): 164-176.
- [11] 张楠. 教育代际流动效应的研究进展[J]. 教育经济评论, 2022, 7(5): 115-128.
- [12] 霍雨佳, 王昭.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教育机会性别差异的路径研究——来自 CFPS 的证据[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8): 75-93.
- [13] 吕国光, 胡一, 张燕. 我国教育代际流动的历程与趋势[J]. 人口与社会, 2022, 38(3): 76-91.
- [14] 张楠, 迟景明. 高校扩招促进代际流动了吗?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2, 21(3): 68-78+96.
- [15] 彭骏, 赵西亮. 教育政策能促进农村教育代际流动吗?——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与经济, 2021, 37(5): 20-31.
- [16] 霍雨佳. 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代际流动与机会不平等分解视角[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 42(8): 52-69.
- [17] 李保忠, 陈新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际流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社会科学动态, 2021(3): 71-76.
- [18] 李修彪, 黄乾. 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程度的测算: 基于 CGSS 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18): 46-49.
- [19] 王处辉. 警惕教育发展中的“马太效应” [J]. 人民论坛, 2020(Z1): 126-129.
- [20] 李军, 周安华. “学二代”现象普遍存在吗?——基于教育数量和质量的代际流动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18(6): 33-44.
- [21] 罗楚亮, 刘晓霞. 教育扩张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2): 121-140+207.
- [22] Mosteller, F. (1968) Association and Estimation in Contingency Tabl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63, 1-28. <https://doi.org/10.1080/01621459.1968.11009219>